

# 名儒矢志女学30年

侯福志

“万世为师表，全球孔独珍。德真天地配，道贯古今人。嗚嗚(音hè)超群圣，肫肫(音zhūn)寓至仁。皇王犹叩拜，血气共尊亲。美富宫墙峻，光明日月新。生民诚未有，愿学自根因。历代隆封溢，春秋盛祭陈。从来看最上，无不敬如神。”这是名儒李厚山于1942年1月吟颂孔圣人的诗作，表达了他对号称“万世师表”孔圣人的崇敬之情。

李厚山乃为前清秀才，创办了武清县第一所女子小学，这在武清教育史上抒写了浓重的一笔。

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，当年经绅民呈请，在武清县城(今城关镇)内设立劝学所，但这个所谓的劝学所，只是一个民间的推动教育发展的一个机构，它本身不具有学校职能。在劝学所的努力下，武清部分乡镇陆续成立了几处书

院及义学。一直到民国七年(1918)，在县长唐肯的主导下，全县乡村才陆续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小学校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早在清末，武清县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女子小学教育。据1942年7月10日出版的《新武周刊》载，1908年前后，李厚山在县城(今城关镇)办了女子小学堂，它是武清县历史上第一所，也是唯一的一所女子小学堂。

关于这所学校的创办，与李厚山关系密切的另一位武清籍教育家、诗人贺仲儒在一篇文章中专门作了介绍。贺仲儒称，该女子小学堂创办之初，即面临了经费不足的困难。为此，李厚山四处奔走，以百折不回的精

神为学校募集捐款。经费落实后，他还要筹划师资，安排招生，这“当然要耗费许许多多的精神”。学堂成立并正常运转后，他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。“先生大志不经纪款项，恐怕被俗物所沾染。有一时期，庶务无人，欲使先生暂时兼代收支，先生期期以为不可，而而去就争，至今传为佳话。先生一世清廉，这是被一般人第一心折的事情”。

李厚山虽致力于教学，但他并非不关注社会。“先生耿直喜讽刺，而且嫉恶很深，往往听见不平的事，或是批评到一般人所不齿的人，难逃先生的冷嘲热讽，甚至怒骂一番，以泄胸中不平之气。”

1939年，贺仲儒在天津

以授徒为业。出于爱乡爱土的情怀，他课馆之余编纂了一部反映武清历史文化的“诗话”。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武清县曾出了一位名叫张晚农的侍郎，“他以诗文名于世”。李厚山与张晚农为望年交。为搜集这位张侍郎的资料，贺仲儒曾专门赴李厚山家进行采访。李厚山虽已年高健忘，但仍能背诵张侍郎的一首诗——《半闲堂斗蟋蟀》。而李厚山“自存谦抑，未肯示以自己的诗句”。这段掌故，已被贺仲儒载入《约旨斋诗话》一书中。只可惜，《“诗话”》未容就止先生(指李厚山)，而先生已逝世了”。

德配天地，道冠古今。李厚山以孔圣人为楷模，矢志女学30年，被时人誉为“人瑞”。1942年6月，就在他创作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首诗后不到半年，即在病床上溘然长逝。

张寿臣讲过，他一生中，有一个最大的恨和一个最大的爱。先说恨。第三代艺人“万人迷”(即李德钊)1926年在沈阳去世后，张寿臣扛起“大旗”，最终被誉为“相声大王”。天津沦陷前，其在小梨园和天津仁昌电台演出，生活一度还算可以。

后来，汉奸袁文会依靠日本人对艺人进行欺凌压榨。一天，袁文会手下到小梨园找到张寿臣，说“袁三爷(即袁文会)的剧场，缺一场相声，请你去”。袁文会心狠手辣，什么缺德的事都干得出来。怎么办?当时南开大学有位周教授是张寿臣好友，说“先到我家躲几天，避避风头”，没想到袁文会的手下又到张寿臣家中威胁其妻子孩子。去吧!一家老小的性命要紧。张寿臣原想此去可能会遇到给钱少、受气受辱的情况，根本没想不到去的当天竟被袁文会羁押了。同被羁押的还有京韵大鼓女演员金慧君、大撸拉戏盲艺人王殿玉等十余人。每次演出前，袁文会的爪牙“护送”着他们一起到剧场去;散场后，这些演员就被押到袁文会控制的小旅馆。每日只供简单的膳食，一文钱不给。逃跑，不可能。拼命?张寿臣家里还有岳母、妻子和三个孩子，他们怎么办?一个

月，两个月……1939年，洪水突袭天津，南市所有的剧场因被淹无法再演出。这十几位演员借机逃了出来。到了家，张寿臣惊呆了，只见家中一片狼藉，床铺、箱、柜及其他家具均淹在水中。一家老小苦面愁肠，凄惨地蜷缩在床角。此后时间不长，张寿臣的妻子王氏一病不起，不久病逝。

而此时的张寿臣连料理妻子后事的能力也没有，多亏有师弟从北京赶来帮了他。

他的爱非常朴实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组织给艺人评定工资级别，张寿臣说自己这个年龄，基本上不能演出了，若在旧社会就得饿死。没想到组织给他评定了不低的待遇。张寿臣感动之余，就琢磨怎么发挥余热。后来，张寿臣提出，每周四上午到天乐戏院为相声演员无偿讲课。开课后，马三立、郭荣起、常宝霆、赵佩茹及全市主要相声艺人每场必到。一天，天乐戏院停电不能用电梯，考虑到张寿臣上楼吃力，大家就劝他回家，停一次课，但张寿臣不干，硬是找来晚辈搀扶着自己上了楼……

凡是为曲艺界做出过贡献的人都不应被忘记。您知道谢添创作的相声吗?咱下篇讲。

## 张寿臣的恨与爱

孙福海

## 记忆中的风船

么庆旺

得的。因海上生活多风险，所以渔民、船工禁忌多，像“翻”“扣”“覆”这一类字眼(哪怕是谐音)，都不准说出口。“帆”与“翻”同音，即在禁说之列。这样，“帆船”就变成了“风船”，“帆”也改说为“篷”，升帆、落帆，改说“撑篷”和“落篷”。

自帆船被机器船替代

后，古老的“风船”成了文物一样的事物。而当风船盛行时，船型各种各样，现在还留在老一代闯海人记忆中的船型有津沽改撬、排子、小鸡、鸟高、元盘底种种，而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当属于家堡以及山东长岛一带的栝篓船。据史料记载，栝篓是一种爬蔓的植物，果实可以吃。其果实，两头尖尖，中间鼓胖，栝篓船就因与这果实相似而得名。这种类

型的船，载重量大，行驶平稳，可做渔船，也可作货船。栝篓船有大小几种，通常一个篷的叫“小栝篓”，两个篷的就称“大栝篓”。大栝篓船上，船工一般十七八个人。

上世纪40年代，我每天放学后，总跑到海河边，去看往来的风船。站在那堆满蚌壳的高坡上，望着那一条条形如宝剑般驶来的大小风船，真是让人快意。到了傍晚，从于家堡启新洋灰码头一直到三井码头，约有上百条风船停靠在一起，气势非凡。

记忆中的风船，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。

## ●津沽浮世绘

### 榻榻米

田恒玉



如今，“榻榻米”的称谓有些混乱，有的床铺、沙发、折叠床甚至装修样式，都叫“榻榻米”。六十多年前，只有如图这种挺挺的稻草垫子叫“榻榻米”。其名称和制作方法，源自日本。如今只有名称尚存，用的材料都是既舒适又美观的时兴材料。由此管窥，可见社会发展之一斑。

上菜时间过长，招致一些怨言，但饭菜质量与服务态度仍给食客留下深刻印象。20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儿子周铨曾听一位同事说，有一次同事家在小白楼一餐馆就餐时，和餐馆发生纠纷并投诉到了和平区饮食公司，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示，像周家食堂韩经理那样的人，是少见的。

周衡与夫人韩若芬都很富有同情心。1939年天津遭遇水灾，周家把住在平房低洼处的安师傅与周家佣人都安排到家中，包吃包住不要钱。1949年冬天的一天，韩若芬发现后门胡同中有一个流浪儿，衣着单薄，蹲在地上，冻得浑身发抖，就收留了他，还让他在食堂做了学徒。厨师的孩子、保姆的孩

子也长期在周家免费吃住。韩若芬在“文革”中受到迫害，1965年周铨与妻子带着四个孩子迁到西青区张家窝居住。

韩若芬从小时候就最疼周铨，然而在她需要帮助的那段时候，周铨未能给她更多的照顾。后来，韩若芬患上了血压高和心脏病。1976年6月她突发脑溢血，周铨和妻子昼夜在医院看护。周铨曾拜老中医邹焕堂为师，在农村用针灸挽救过中风病人的性命。虽然周铨竭尽全力为母亲针灸，却无力回天。1976年7月20日，韩若芬离世。

## 津沽文丛

周家食堂始末之三

## ●诗话津沽

### 止庵诗作言津地

章用秀

周学熙所著《止庵诗存》(1948年至德周氏自刊本)的不少诗作所言及景物、人和事多与天津有关联，其中《七月六日洪水突至津埠尽成泽国》记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遭受水灾的惨状：“须臾平陆变深渊，真似黄河水自天。风卷涛声村树杪，日摇波影市楼颠。几多行李成漂杵，百万流民在露田。安

得贤能如赵抃，疗饥拯溺护生全。”《重九登电梯升中原五楼茶楼》道出了作者对初设电梯的新奇：“不须拾级上高楼，足底生云冉冉浮。放尽胸前千里目，扫空眉上百年忧。”另有《大公园看海棠》所写乃作者当年游英租界内公园之所见所感。

周学熙，字辑之，号止庵，安徽至德人，长期居住在天津。1905年出任天津道，1907年任长芦盐运使，办商陈陈列所、种植园、天津铁工厂、高等工业学堂等。

## 响当当的韩经理

张绍祖

周家食堂开业那年，韩若芬才39岁，精力旺盛。其丈夫周衡64岁，对经营食堂做不了任何事。周家食堂的内外操作，全由韩若芬一人担当，是响当当的韩经理。周家的三儿媳担任食堂会计。

每天，韩若芬光是站在厨房安排配菜、上菜的时间就有八九个小时。每当熟客、名流来光顾，她都会亲自去打招呼。轮到一周一天的休息日，常常因为生意忙而不得歇息;此外还有周衡与三个年幼的子女需要她分心照顾。开业初期，韩若芬最

小的儿子刚刚七八岁，经常在店里最忙的时候，跑到她跟前撒娇，甚至惹她生气。她的大女儿于1949年出生，二女儿在1951年出生，为了经营食堂，她不得不给大女儿找了个保姆，又将二女儿托给大儿媳照顾。

韩若芬把周家食堂搞得井井有条，她与主厨安筱岩师傅切磋，不断对菜品进行创新改进，使菜单更加丰富多样。她曾跟儿子周铨说，在国庆十周年时，她整理出了周家食堂的200多种菜谱。

在她的努力下，没用几年时间，周家食堂就成为天津市有名的餐馆。有一段时间，周家食堂因厨师少、食客多，

## 避暑胜地游船多

方博

上世纪30年代，八里台青龙潭成为天津的避暑胜地。其由天津河连通，四面环水，无陆可达，最佳的交通方式就是乘船。1942年第十六卷第十五期《三六九画报》上刊登《青龙潭》一文，副标题即为“轻舟泛绿波，香荷满池塘”。

文中生动地描绘了驾船游览的感受：“说到青龙潭的气派，处处青绿的田野，清脆的雀语。一叶扁舟，荡漾其中。船桨拨水声，形成一种天然的音乐。空气中微风带来野花绿草的香气，使人身心清爽。相偎依的情侣们乘船谈心在这潭面上，真是点缀得有声有色。你可以雇船加入，船可以带着你探寻胜景去。”

1930年，游泳比赛在青龙潭及周边的南大坑举行，引来众多市民前来围观。同年8月21日的《北洋画报》载《南大坑赛水记》称，“是日参观者甚多，坑中舳舻相接，围坑而列者至百余艘。举凡法国教堂、海光寺、八里台、佟楼之船，一

而空”。甚至连平日运送沙土泥石的船只，都被用来应急。由此看来，船价自然飙升。“较平日倍之，贵者则又倍而倍之”。对于这盛况，周围的村民们也颇感新鲜。“吴窑桥(应是吴家窑的别称)、八里台一带住户，倾家坐岸上看游船，大小男女，罗列如山”。岸上的村民与船上的游人，彼此互看，各得其乐。

卫津河上游游船如织，泛舟游览青龙潭，在当年的民众看来，是夏日里难得的休闲。但考虑到安全因素，1931年7月30日，有关部门在《益世报》上发布《八里台游船夜半后禁止行驶》的通知：“近来由马场道通南开八里台一带，游船如蚁，男女云集。……对于此项往来游船，于每夜十二时以后绝对禁止行驶，以免发生意外危险……”

这种驾船游览的独特方式，应该是当年青龙潭吸引游人的一大原因。